

憶說蔡元培

謝康

蔡元培子民先生，生於民前四十四年（一八六八）一月十一日，今年一月十一，是他的一百一十一歲誕辰，敬撰此文，以作紀念，並誌景仰之忱！

桂林公祭與滿江紅詞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旬，我從歐洲經越南歸國，回到桂林不久，正在奉命籌辦廣西教育研究所的時候，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接獲香港電告蔡元培先生逝世噩耗。當即通知省政府教育廳及其他文化機構聯合發起追悼大會，於一星期後在北大禮堂舉行，由君武先生主祭。當時正在抗戰中期，桂林為後方重鎮，有「文化城」之稱，附郭岩洞，也是避空襲最好的處所。因此旅居桂林的學術文化界人士頗多，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及北大畢業同學留桂者亦不少。為着表示景仰和惋惜這一代偉大的哲人和文化教育界導師，大家都踴躍赴會，所致送的輓聯和輓帳等很多，我也有一副輓聯云：

「論文章道德、俱足千秋；數並世名

賢，共仰大名垂宇宙。

為民族國家，興悲梁木；讀滿江紅

曲，長留浩氣壯山河！」

蔡先生逝世迄今，將近四十年了，但回憶起當時我在桂林參加追悼會的情形，還好像是昨天的事體，歷歷如在目前，由於印象特別深刻的緣故。

我和蔡先生沒有師生之誼，或者勉強說是「私淑弟子」吧。但從留學歐洲這一層來說，那也可算得是留歐洲的先後同學呢。我這付聯語雖不工整，亦可藉表敬意。其中所說的「滿江紅詞曲」，大家都知道宋岳武穆王曾有以「怒髮衝冠、憑欄處」起頭的一首，是很著名的戰鬥精神作品。另一首以「遙望中原」作起句的也充滿了忠義憤發之氣。蔡先生於逝世前半年，應李石曾先生之請，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所撰的一首會歌，就是用「滿江紅詞譜」來作成的。這首會歌，曾經國內各大報發表過，很多人都知道的，當時分會主任鄭彥彥兄也曾對我說過。其後我到重慶幫辦分會的事務，那時候倪文亞、梁大鵬、繆培基諸兄，都在分會任職。（會長是宋子文

先生）。當我們開大會唱會歌時，唱的就是蔡先生所填這首滿江紅，意思很悲壯。其詞云：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贏蝕。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寧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讚揚蔡先生的誄詞中，以蔣夢麟先生的一段話最得體，也最扼要。他說：

「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先生（按指蔡先生）應運而生，集兩大文化於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師歟！」

夢麟先生這番話，並不怎麼誇大或溢美。但除蔡

先生外，近代的中國人，恐怕只有 國父孫中山先生足以當之。至於胡適之先生雖則庶幾無愧，但他對歐洲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刻；對中國文化則不够尊重，我以為這也許是胡不及蔡的地方（？）

蔡先生逝世後半個月，戴季陶先生作「蔡子民先生行述。」有云：

「蔡子民先生，當代之大師，而清末之名進士也。既成進士，而更致力於學不厭、教不倦。始也竭個人之力，興學於滬上；既也，受國家之命，主教於北京。此二地之蔚為南北人文淵藪者，是非先生之功而誰與歸？……：古有言曰：『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隱非先生之志、聞子民之號，而先生之無限苦心，可察而知之矣。今先生既沒、憂患方深。環顧南北、應知民族僅存之元氣，實賴先生之培養。門牆桃李，幾遍天下，或以學術，或以事功，各致力於其所應作。是『子民』先生去，而『元培』先生則永與中華民國同其無量矣！……」

戴先生此文，對蔡先生致力教育之功，再三致意。並從「子民」兩字，看出他的無限苦心。詩經說：「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蔡先生於三十八歲時，自號子民，不僅表示其悲天憫人之懷，亦有以周遺民自況的民族意識。那時是光緒三十年，同盟會正式成立前一年。他的參加民族革命的同盟會，志切匡復中原，反對異族專制的精神，已昭然若揭了。至於「元培」，季陶先生解釋為培養民族元氣，而培養民族元氣或個人的正氣，

胥以教育為基礎。先生一生培元的工作，除兩任教育部長，一任大學院院長，一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外，都直接從事學校教育。他於十八歲時在家鄉紹興縣設帳（即開私塾）授徒；三十三歲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三十五歲為上海澄衷學校及南洋公學教員（在南洋公學的職務，是特班生總教習）。三十六歲籌備組織中國教育會，被推為會長，旋於上海創辦愛國女學。五十歲，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稚暉及法國友人創立華法教育會，辦華工學校，並任教師。五十一歲，任北京大學校長，前後共約十年，在這期間，曾協助吳稚暉、李石曾等創辦里昂中法大學。總計從十八歲至六十歲（是年辭去北大校長，其後又曾兼校長名義一年，由陳大齊代理）。先生直接辦理學校教育時間，由學塾而大學，共約四十餘年。

此外從六十二歲起至七十三歲逝世為止，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凡十二年，則純粹為學術文化研究工作，但亦與教育事業有關。

對教育學術的貢獻

因此，我們追述蔡先生的一生貢獻，首先得承認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教育家。他付出大半生的心血，辦理教育，尤其對於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成立得最早的一間國立大學，在蔡先生的領導下，經過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和多采多姿的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北大不獨成為第一間金字招牌的全國最高學府，同時也是新舊學兼收並蓄的知識水庫，尤其是吸收和傳播西方文化和自由思想的發音筒

及轉播站。

五四新文化運動，如果是新舊交替的轉捩點，那麼北大就可說是掌握這轉捩點的總樞紐，而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幾位前輩學人就是其中的導師或把握着方向盤的舵手。

溯自康梁等戊戌維新失敗至一九〇三年（癸卯）張百熙等奏定學堂章程，傳統的經學時代科舉和書院式的教育，已壽終正寢。但仍有些藕斷絲連，故以「忠君、尊孔」為中國政教之所固有，亟宜發揚光大它們，以作排斥異端邪說之用。其次為「尚公」、「尚武」、「尚實」，希望能藉此革除中國人原有的「自私」、「體弱」、「虛偽」等毛病。這是滿清末年（一九〇六年）也是民國前六年所公布的「欽定教育宗旨」的五個要點。這次的教育宗旨，可說是不中不西，其實是中國意味多於西化的意味。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大體上是頗為符合的。

蔡先生對中國學問已有很好的根柢，然後以翰林公游學西歐德法二國多年，深知學術乃天下之公，真理應無中外之隔。先將中體西用的舊觀念，根本去掉；然後虛心研究西洋哲學加以批判的接受。因為他能融貫中西，取精用宏，發為文章，頭頭是道，毫無舊式文人的頭巾氣及陳腐思想。同時已不是那些一輩子趨時髦，只顧販賣西洋知識而昧於自己的國情和民族意識的人所可同日而語的。

蔡先生是一個學術興趣非常廣汎的學者，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的人物。四十歲開始留德，在柏

林和來比錫；五十九歲第二次留德，在漢堡大學，同時或先後研究的科目：有哲學、文學、美學、文化史，人類學及實驗心理學等。甚至在他生命歷程最後的一年，還同蕭瑜（號子昇）在香港九龍的寓所研討法國思想家居友（J.M. Guyau）的學說，孜孜不倦。那時候先生精神尚好，有時一連討論幾個鐘頭，也不覺得疲倦。蕭子昇兄恐怕他太累，問他要不要休息，他總是說：「不累不累，有趣有趣！」（見蕭著：蔡子民先生自傳之一章）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的治學精神，的確是老而彌篤的。

如所週知：北大是在蔡先生做校長時候，才有長足進步的。在京師大學堂時代，沒有什麼特殊成績可言，學生們多半是做了官的大爺，或貴族的少爺們，到學堂上課或住宿的時候，各人多是帶有自己的聽差來侍候的，因此官僚派十足頭腦多烘的「中老年大學生」頗多；滿清的學部尚書，似乎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到了民國二、三年，袁世凱已表示願意做皇帝的野心，更沒有革新教育的觀念。那時候研究文史學的人，還多少有一點實事求是的樸學傳統精神，但一般師生的習氣，多半仍是故步自封的。

蔡先生自民國六年到北大，即以一種寬容大度，兼收並蓄，休休有容的民主精神治校，使北大真正成其大。他的為人正如書經泰誓篇所說：

「如有一介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蔣夢麟氏稱蔡先生具有孔子的溫良恭儉讓精神，在他眼光中個個都是好人。大學之所以為大，正需要這種能够兼容並包，自由研究學術，而不為門戶派系的界域所限。蔡先生生長北大，所延聘學有專長的教授，各種人物都有：有拖辮子的辜鴻銘，思想守舊的黃侃、陳漢章，曾經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劉師培，提倡「性解放」的張競生和高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梁漱溟。但也有提倡儘量西化和實驗主義的「我的朋友」胡適之，親日派的周作人，極端疑古而改姓的錢玄同，和思想本已左傾而後來搞共產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甚至北大圖書館裏面，還僱用了一個助理員毛澤東！）外國教授，則有羅素、杜威等，真是五光十色，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在蔡先生底尊重學術研究和思想自由，容納異己的作風領導之下，北大教授的陣容可說是人才濟濟，在全國各大學中首屈一指，而當年的北大因此也就成其為「大」了。

據左舜生氏的看法：蔡先生酷愛自由，尤其酷愛學術思想的自由。他把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實行共產主義，絕對不容混為一談。因為研究屬於思想的自由，而實行則牽涉到實際政治，甚或以行動擾亂社會秩序，兩者必須要截然分開，然後可以保持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個正如同他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幾位同志朋友相信無政府主義，在三千年後可能成功，（稚暉先生語）；但在現階段，他們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為實現「國父遺教而努力的。並且在民國十六年四月，他們曾經建議中央，舉行

清黨，以免跨黨的C.P.和C.Y.分子（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國民黨內部搗亂，對外假借名義招搖撞騙、掛羊頭、賣狗肉，分化國民黨的團結力量。

教育宗旨四大理想

蔡先生兩度出任長教育部，一度出任長大學院，在民國元年教育總長時代，他手訂中華民國教育宗旨：

「注重道德教育，以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輔之，而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這些話也可代表他本人對中西教育文化採取融會貫通的態度。他並且另發表一篇文章，說明這項「新教育意見。」

蔡先生的道德教育思想，決不只是根據單純的中國倫理思想的傳統，他在德國研究康德哲學，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特別注重道德，尤其是自覺自制的道德律。康德曾說：

「人底兩種目的及義務，在於自身之完善及他人之幸福。對自己來說：我應該向自身完善的路途邁進，但不是為着求福求名，或趨樂避苦。對他人而言，我應該為他人或羣體謀幸福，但不是負責成他人道德的完善。……」

「道德不是天生的，人底高尚人格之養成、為教育之最終目的。」

蔡先生的「道德教育」除儒家和康德思想的關係外，還很受法國大革命思潮的影響。蔡先生在「新教育意見」那篇文章裏解釋「德育」為公民道德教育」。他說：

「何謂公民道德，由法國革命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博愛，道德要旨，盡於是矣……」

他心目中的道德，包括自由、平等、博愛，好像在舊瓶中滲了許多新酒，已不是傳統的儒家倫理所能統攝的了。但他仍引經據典來作證，他之所謂道德，乃是偏重公民道德方面。他說：「自由」古謂之「義」，「平等」古謂之「恕」，「博愛」古謂之「仁」。仁義和恕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源，公民道德必須把它們放在內。他認為舊倫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諸德，都是家庭範圍內的私德，雖然也應該適度的保存，但不及上述自由、平等、博愛這三種公民道德，更來得重要，因此我們不能墨守成規，站在家庭本位來提倡私德；而必須從國家社會人羣關係上，甚至以人類為一體的觀念上談道德，才能符合民主時代的要求。

他所謂「實利教育」，可說是生產教育或實業教育，和國計民生關係很大，也可說是民生主義的教育，包含現代科學知識（智育）在內。他認為這是提高生產，救濟貧窮的利器。

至於「軍國民教育」，則導源於儒家「有文事必有武備」的觀念和德法兩國全國男子皆服兵役的精神。他說：

「軍國民教育的目的，固然在以武力自衛和恢復已失的國權。還有一種意義也很重要：就是防止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之特殊階層，（按即所謂「軍閥」或有槍階級）必須實行全國皆兵的制度，以制止少數軍人成為特殊勢

力的傾向，而提防其流弊。」

蔡先生在民國元年似乎已預見民國以來（國府統一全國以前）北洋及各省大小軍閥割據地盤，擁兵自雄及後來毛匪稱「槍桿子出政權」的怪現象。他要使得軍隊國家化，不為野心家所操縱，所以極力主張實施軍國民教育。換句話說，也就是全國人民（特別是男壯丁）的軍事訓練或服兵役的義務。這個主張，文武合一，避免過去「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而使傭傭兵成為私人武力的毛病。而且軍事教育的推行，對於振興體育自然也很有幫助。

可是到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部份天真的教育者以為天下從此太平，不再有戰爭發生。於是極力非難「軍國民主義」，學校裏也廢除了兵操及軍訓，使國民教育中的尚武精神，歸於低落，說起來真令人不勝感嘆。（筆者於民國八年當高等小學校長，體育課程上還有兵操，用的是木槍。）

說到「美感教育」，尤為蔡先生所注重。此一見解，亦可溯源於康德哲學。康德在「判斷力的批判」一書中，討論美學問題。以為美的快感，由於自由底觀照而生。不含有任何對象的欲求；故可稱為超利害的快感。而且美的對象依自身的吸引力及移情作用，不僅使主觀的個人發生美感，同時亦可使其他的人都發生美感。康德因此認為美感概念，其悅人為必然性而為超利害的，故美的對象就是自由與必然的結合。

蔡先生著有「康德美術學」一卷，未出版。他解釋美感，認為要合「美麗」與「尊嚴」而言

，實導源於康德的「優美感覺與崇高感覺」的理論，相信美感教育為實現世界主義教育的唯一方法。蔡先生的世界觀，也就是他底宇宙觀和形而上學的結合。他認為世界有兩方面，一個是現象界，一個是實體界。現象世界以造成現世幸福為鵠的；實體世界，則以實體觀念之永久價值為目的。而提撕實體觀念的方法，必須實行「世界觀的教育」。這世界觀的教育，他以為可分兩方面：（一）消極方面，使人對現象世界無厭棄，亦無執着。（二）積極方面，使人對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進於領悟，循思想及言論自由公例，時時懸一無方體無終始的世界觀以為鵠的。但如何能達成世界觀的目的呢？他認為美感教育實為必要。因為他根據康德的說法：美感乃是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造成一道橋樑的。他說：

「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於藝術，則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脫離一切現象世界相對的感情，而成為渾然的美感。亦即所謂與造物者游，（按此語出於莊子），而已接觸到實體世界的觀念。因此，教育家希望由現象世界而引達於實體世界的觀念，不可不用美感教育。」

蔡先生強調美感教育的重要，認為可以涵養德性，並可以提倡美育來代替宗教，陶冶人類優美而崇高的感情。更有移情作用，使人為美所陶醉，使人忘却自我，超乎利害及實用的範圍，（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去掉了自私

心，這就是說藝術可使人們的情感，從現實世界超升，引導精神生活達到一個更完美的境界，這樣便可以幫助道德教育的進步和完成。這一層，我想在真正的美感經驗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得到。

以上大概是蔡先生所訂定的教育宗旨的意義。如今我們所常說的德、智、體、羣、美五育。都是和他底教育理論有關的，特別是德育（包含羣育，因為公德就是羣育）和美育。但是，現在也有許多人單講德、智、體三育，而遺漏了羣育和美育。事實上，現在台灣地區的高等教育，多半是注重智育，而忘却其他四育的。甚至在智育（即知識教育）中，亦只注重記憶，為應付升學之用。這樣，要求得真正的知識，似乎也很難辦到。為補救我們今天教育的缺失，我以為蔡先生的教育宗旨，實在有重新拿來研究的必要。

蔡先生對於美育理論的發揮，淋漓盡致，並曾經發表好幾篇文章。（如美育與人生、美育的實施方法等篇），暢所欲言。對我國美感教育的實施，很有貢獻。至於他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說」，雖曾經在江蘇省教育會和北京神州學會等處演講，但響應的人不太多，並曾引起宗教界人士的反對。因此，使他的這種學說，無法見諸實行。

讓我們從精神生活的領域上看：宗教信仰是人類的精神生活。它要解決的問題，是人類的靈魂及其最後的歸宿，屬於超自然方面的事體。美育（或藝術陶冶）屬於美感經驗，或者說由感官（特別是視覺和聽覺）所感受得來的快感和

美感。宗教信仰和藝術功能，兩者的性質既不相同，各有各的領域，雖則互相有關聯，但不能彼此代替。幾千年來的人類宗教史和藝術史告訴我們：這兩種精神生活，都各有其價值，早已共存共榮，分頭發展，道並行而不相悖。在十九世紀時，尼采早已宣布上帝死亡，然而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相信耶和華上帝的，至今至少有八九億人口之多，在信奉馬克思無神論的極權主義國家，也不能完全消滅它們國內人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不能由唯物史觀來代替，也好像注定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學說，是必然歸於失敗的。

非宗教和廢止祀孔

我還記得民國十一年，胡適之先生辦「努力週報」的時候，國內有一部份人，發起「非宗教大同盟」，很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努力週報也曾努力替這種「非宗教」的組織，宣揚一番，但到後來也沒有什麼結果。

人類對宗教的信仰，根深蒂固，絕非任何東西可能代替。孔子是理性最發達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他雖則少談鬼神和死後的事，但他仍參與祭祀，祭神如神在，尤其提倡祖宗崇拜，他並沒有想到用倫理道德來代替宗教，（從社會學上看，宗教和道德，同樣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事實）。

蔡先生因為他自己主張宗教信仰自由，進一步就同情「非宗教運動」，這件事使中國教會大學，曾經受了一些打擊，同時對於世俗化的教育

和人文主義思想教育，發生了鼓舞的作用，但也發生一些反感。具體的一個例證，就是儒教信徒對於他在教育總長任內提議各學校不祀孔子這件事的盡力攻擊。

原來在前清時代，各書院或學堂，必須祀奉孔子，每逢孔聖誕辰和朔望日（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全校師生，必須向大禮堂中的孔聖神主牌，行三跪九叩禮。我記得在光緒末年讀小學堂時，就是如此這般地叩頭如搗蒜的。至於在私塾裏讀書，也是每月兩次向孔老夫子行最敬禮。因為「尊孔」是專制王朝欽定的教育宗旨之一，讀書人絕不可能有異議的。（孔夫子名丘，讀時要唸作孔某，寫的時候要缺一劃，以示尊敬。）

但是科舉既廢，孔家經典的權威已見低落。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國體變更以後，「忠君、尊孔」的教條，自必首先受到檢討。蔡先生雖係前清進士翰林，舊學根柢深厚；但他受了西洋哲學文化及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包含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使他的思想平民化、科學化、平等化、自由化和革命化。由於這些思想的推動，當然不贊成專制淫威下的思想定於一尊。何況學校要祀奉孔子，類似孔廟，全體師生，每月兩次向孔子神像或神主牌行拜跪禮，躋孔子於教主之列，宗教意味，甚為濃厚，無宗教之名，而有其實，頗不合於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蔡先生於是由教育部通令全國學校，停止祀孔。

這件事對於兩千年來（從漢武帝獨尊儒家算起）流行甚久的尊孔觀念，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自難免引起自命孔子門徒如康有為、陳煥章、

葉德輝他們的反感。民國五年上海時報記者有一篇論文，題為「論蔡元培提議學校不祀孔子。」原文頗長，不能全錄，僅摘錄其中的警句，如下：

「甚矣前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悖也。民國初基，學校頹廢。蔡元培管領全國學務，於扶衰起敝普及教育之政策，毫髮無所建樹。所汲汲以為先務之急者，乃惟是學校罷祀孔子一事。……充蔡元培之所為，不至舉數千年流傳之道德學術倫理拉雜而摧燒之不快。夫至一國之人，而皆無道德無學術無倫理，則其離禽獸也不遠矣。……」

蔡氏所持為論宗者，謂祭祀為宗教信仰之儀式，孔子非宗教，不當以宗教之儀式奉之。……孔子誠非宗教，然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以來，緣時主表彰之力，成爲人事上之宗教，二千餘年於茲矣。此二千年中，吾國之言倫理學術者，悉爲孔學之所演成……從來無形之信仰，常藉有形之儀式以獲存。若舉儀式而廢之，則中材以下信仰心，亦將與之而俱弛矣。……」

時報記者這篇妙文所持的理由頗多，大致不外以孔子之道乃國民信仰所宗，國家安危所繫，若一旦不祭孔子，則中國以儒家爲主的學術文化，行將解體，以至「閭里絕絃誦之聲，城闕有吶喊之慨。」流弊所及，教育停頓，人心不安，國家也將不成其爲國家了。

這種保衛孔教，使思想定於一尊的極端保守論調，固然也有它自圓其說的理由，但從主張自

由思想的蔡元培看來，那是不值一駁的，只好付之一笑而已。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蔡先生一方面在「非宗教」反對宗教性的教育，而想以美育代宗教。另一方面，在同盟會時代，一九〇五年，他却翻譯日本人井上圓了所著「妖怪學講義」，在上海出版。書中包含有魔法、妖術和鬼怪學。這是一般認爲是左道旁門的東西，他又不免有點傳播迷信之嫌了。這算不算一種矛盾現象呢，容再查證後作答。

中國民族學的先驅

蔡先生除以教育家、思想家著名而外，他還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倡民族學的民族學家。他曾經在德國萊比錫和漢堡，特別研究這門學問。在北大開設人類學講座，（包含民族學在內）他的學生中對於民族學很有心得的，有何聯奎、黃文山；此外如楊成志、徐益棠、劉咸，以及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組和民族學研究所中早期研究民族學的專家如芮逸夫、凌純聲、林惠祥等，都直接或間接受蔡先生的薰陶或啓示，而各有所成就的。

上述幾位學人，都是筆者所認識的朋友或同學，他們一致認爲蔡先生是中國民族學的開山祖。

「民族學」(Ethnology 舊譯人種學)爲人類學的一支，以研究各民族文化爲主，在英國稱爲「社會人類學」，在美國稱爲「文化人類學」，乃異名而同實。現在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有「民族學研究所」、政治大學有「民族社會學系

」，台灣大學有「考古人類學系」等研究機構，人才輩出，所印出的研究報告，亦有可觀。三十年前何聯奎兄曾爲文紀念蔡先生說：

「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風氣之長也，必有所以成。自先生倡導民族學之研究，繼之以中央研究院之推動，再繼之以學校機關之推廣，又繼之以學術團體之推進，青年學子趨之而爲風氣之迎，致力於民族學之發展。由於各方之分工合作，已有不少良好之收穫。」

我們從這幾句概括的話，已可看出蔡先生對於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領導工作的貢獻。

民族學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大概等於社會學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一般研讀國父民生主義的人，多知道有社會主義和社會學的區分；但是讀過民族主義的人，多不知道什麼叫做民族學。其實這門學問的興起和成立，都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時間也差不多同時，都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由於民族學在中國尚未發達的緣故，許多人對於自己民族文化的演進，關於中華民族如何構成，多不明瞭。有些號稱學者名流，也不免信口開河，數典忘祖，這些歪曲中華民族或民族文化的作者，都可說是蔡先生的罪人了。

筆者祖籍廣西，做省有漢、苗、侗、僮各族，而以漢族人數爲最多，約佔四分之三左右，其餘則通稱爲特種部族，其中以僮族人數較多，估計當有三百多萬，但最多也不超過全省人口四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已經和我們漢族同化，早已泯滅了種族的界限。但由於中共幹部不懂民

族學，或由於政治的原因？近年來硬將廣西省改爲「壯族僑自治區」（韋國清即該族要人之一），這種胡作妄爲的蠻幹作風，也是違反歷史和民族學的事實的。但不知道他們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假藥！

我還記得我們在三十八年退出大陸之前，國立廣西大學和省政府曾多次協助國內專家來桂考察尋民族學資料。又曾經設立特種部族「人才造就班」及「師資訓練班」，這些都可說是多少受了蔡先生提倡民族學感召。

蔡先生提倡並研究民族學，僅僅是他學術事業的一端罷了，他的民族學論著，也僅有幾篇文章合成的一本小冊子，但內容都很精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原想在這方面多所致力，但因任務繁重，行政工作也够忙碌，不能如願。他曾說：

「我是一個比較還可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

蔡先生爲着辦理教育行政而就誤了研究學問的工作，自認爲很痛苦的。我想凡是不熱衷做官，不願「學而優則仕」而想終身從事研究工作，以讀書爲樂的學人對於那煩瑣的行政工作糟塌了治學的寶貴光陰，必然和蔡先生一般感覺得十分苦惱。

辭職啓事和進德會

像蔡先生這樣博通中外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有其不朽的貢獻，要仔細加以分析，實爲本文篇幅所不容許。他的生平事蹟，王成聖先生所撰「蔡元培和而不同」一篇大作（傳記精華第一集，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和郭湛波氏的「蔡元培的時代及其思想」（五十四年文星雜誌）都可參考。

這裏讓我補錄幾則軼事，以供談助，並結束本文。當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愛國運動怒潮掀起的那一天，警察廳逮捕了幾十個學生，而北大的居多數。經蔡先生與各專門學校校長，向警廳力保，始得釋放。但學生方面仍抱着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方面也抱持一不做二不休的態度，想以高壓手段，迫使學生屈服，不得「滋事」。雙方劍拔弩張，隨時隨地，有發生事故的可能。同時謠言四起，政府準備撤換北大校長，以馬其昶來接事。蔡先生已變成政府所不歡迎的問題人物，他自己認爲不早離開北大，必將被人認爲戀棧，而增加學生對政府的糾紛。於是一面「引咎辭職」一面於五月九日祕密出京，同日在報上發表啓事說：

「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倦矣，欲小休矣。」

殺君馬者，道旁兒也！」

這個啓事的前四句，意思很明白，無非是表示辭職休息而已。後兩句是一句很偏僻的典故，

曾引起一些猜測和誤解，以爲是譏諷政府。其實這兩句話，出自後漢應劭的「風俗通義」，係引用當時流行的諺語。原意是說：「某騎士喜歡戴高帽子，正在跑馬時，因爲路旁許多兒童讚美他底馬兒好，騎馬的技術也很高明。在大家喝采之下，這個騎士更盡力奔馳，結果他的馬兒不得休息，終於力竭聲嘶而死。」蔡先生引這個俗語，他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北大的師生們不要挽留他，政府亦應該讓他休息，以免他太過勞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

蔡先生之爲人，其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因爲他品格清高，賦性恬淡：不與人爭。當學生們對國事激昂憤慨，不能靜下來求學，而常常罷課在街頭示威遊行，和憲兵警察隨時可能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做校長和訓導長的人，的確是非常頭痛的。（筆者本人，就曾經此苦，因此對蔡先生當日的心情，是能相當了解的。）

另一件事是蔡先生對改革社會風氣，是非常注意的。他極反對纏足和討姨太太，主張不嫖、不賭、不吸煙、不喝酒不喫肉、不作官吏和議員。曾經於民國元年與吳稚暉先生等組織什麼「進德會」之類的團體，以資提倡，對社會也會發生過一些影響，尤其在不纏足即「天足」運動方面影響最大。林語堂氏在他的大著「吾國吾民」裏提到纏足的消滅，五四時代的社會運動是一大關鍵。但是，蔡先生所謂進德的主張，有點兒類似苦行主義，對一般人來說，多是做不到的，連他自己也不能嚴格遵守。例如當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和國府委員，是不是做官呢？其實他

做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也有幾分像議員的資格。至於「素食」，我知道李石曾先生比蔡先生好像能堅持到底。但是我問過石曾先生，他的所謂素食，是可喫雞蛋和魚類的，不像虔誠的佛教和

尚那麼嚴格地喫素。

第三件事是蔡先生死後的國葬問題，國民政府的重慶時是通過了的，並且見於明令，但是快四十年了，始終未見諸實行。我早年曾經到過香

港仔華人墳場看過蔡墓，和南港胡適博士的墓園比較起來相差太遠了。然而他倆都是中央研究院院長呀，為什麼厚此而薄彼？我希望將來光復大陸，不要忘記國葬蔡先生這一個典禮！

臺灣鐵路擴充運輸設備

臺灣鐵路一直爲了配合並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及適應內陸運輸需要，在每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中，利用盈餘、折舊準備、和歷次世界銀行貸款，投資於擴充運輸設備，使運輸能量逐年適需而增加，尤其是西部幹線最爲顯著，近二十餘年來該路西線客運量均有極顯著的成長，因之該路車輛設備和營運已將達於極限，路線容量的利用已趨飽和，爲了適應客觀及主觀環境的需要，衝破此一極限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因而經慎重的考慮乃採行最經濟適切的動力電化計劃，若僅就提高路線容量而言，動力電化已具有充分採擇的價值，況其具體目標至爲深廣，兼能節省國家能源，近代各國均紛紛採行電力電化方式，當非偶然。

臺灣鐵路動力電化工程第一期工程基隆至竹南全長一二五·七公里，預定於今年年底至成，第二期工程竹南彰化間山線爲八九·三公里，海線九一·二公里，預定於六十七年底完成，第三期工程彰化至高雄全長一八九·二公里，預定六十八年八月完成，完成通車後其效益，爲(1)提高行車速度加大列車單位，增加總運量百分之五十；減少能源消耗量，節省運輸及維修費用，降低運輸成本；可確保行車安全提高服務水準；並可減輕空氣污染，動力電化工程之進行現已進入高潮，工作緊湊，進度切實把握，爲增加行車效率及確保行車安全，該路在動力電化計劃中增加兩項新設備，也配合

動力電化工程之完成而完成，那就是在基隆竹南間裝置中央控制行車號誌系統(C.T.C.)及在新電力機車上及現有柴油電力機車上裝設自動警告(ATW)及自動停車(A.T.S.)裝置，其性能之優越，效果之良好，特將新設號誌簡介如后：

增加行車效率的新設備——基隆竹南間裝置中央控制行車號誌系統

臺灣鐵路西部幹線電化工程完成使用後，由於動力馬力之加大，行車速度之提高，列車次數之增加，行車號誌亦同時予以配合更新，以便發揮最大效用。故部份地區原有已不能勝任的行車號誌系統，如基隆至竹南間一百二十六公里，設置二十七個車站，現用行車號誌設備爲人工轉轍的雙軌自動閉塞行車號誌，該項行車號誌自光復後不久即已分四期陸續裝設完成，但以設備標準較低，效率已感欠佳，且其中部份設備已達汰舊換新的程度，而電化所產生的電力干擾，必須對行車號誌系統採取保護措施，所以爲了配合電化工程完成後，運輸上的需要須予更新裝置行車號誌系統，此種新的行車號誌系統爲雙軌兩向行車方式，路線容量可由現有的每天二百零四次訴高至每日二百四十四次，不僅路線容量可以增加四十次，而在運轉整理及運輸效益上尚有很多助益。特別是在電化後路線維修或電車線維修時，一線封鎖行車，另一線仍可照常以CTC單線行車方式

行車，不必變更行車制度。

臺灣鐵路使用CTC行車號誌已有多年的歷史，此種設備的控制系統爲全晶體電子式最新設備，全系統適合電化鐵路之用，操作方式爲電鍵式簡單易行，其特點爲列車正常運行或進出車站外，調度員不必逐站處理，呈半自動CTC系統，可減輕調度員操作之煩。其間八堵、七堵、新竹等站的設備爲使用不久之新設備，所以全部保留應用。華山、臺北、萬華等站設備，雖已屆汰舊更新程度，但爲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或地下鐵路計劃，故仍暫時保留使用，俟定案後再另案辦理，以免重複投資。

臺灣鐵路CTC行車號誌系統，已先後在彰化臺南間，彰化竹南間山線及海線裝設使用。自彰化臺南間雙軌兩向行車方式的CTC行車號誌系統完成使用後，使彰化臺南段內，路線容量大爲增加，使原爲瓶頸區段一變爲大肚區段，此一區段不但是列車運轉整理最容易辦好的區段，也是慢分列車恢復正點行駛的區段，不但如此，由於行車號誌全係聯鎖電動，行車安全亦大可確保。

在人們認爲時間就是金錢積極爭取時間的今天，各種運輸工具無不力謀向快速方面進步。航空器已由同音速至兩倍音速；公路通道亦紛紛提高標準，適應高速度行車；輪船亦從改善裝卸方式，變更停碼頭作業習慣，提高航行速度等各方面努力改進。鐵路高速化的方式亦應從不同的角度着手，動力